

略论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

姜明新

内容提要 奥斯曼帝国推行西化改革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奥斯曼帝国内部整肃式复古主义改革的失败。改革都是在外来压力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它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意愿，而仅是出于帝国精英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奥斯曼的社会心理也完成了一个从文化自负向文化自卑的转变，从而深刻地影响现代土耳其的发展。

关键词 奥斯曼帝国 西化改革 精英 社会心理

作者简介 姜明新，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民族学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其过程的惨烈和挣扎、精神上的挫折和磨难，总给我们以似曾相识的感觉。因此，探讨在西方列强的重压下，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奥斯曼土耳其社会在坚持传统还是推动西化的两难困境中的心路历程，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土耳其的政治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奥斯曼帝国推行西化改革的原因

土耳其有意识的西化改革，至少应从苏丹艾哈迈德三世时算起，至今几近 300 年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改革取向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改革的根本原因包括两个方面：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奥斯曼帝国内部整肃式复古主义改革的失败。

（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任何大帝国的兴衰都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¹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除了“千年帝国”拜占庭内外交困下的衰落和突厥塞尔柱王朝在蒙古远征军打击下土崩瓦解这样的外部原因外，其内部关键性因素大致有 3 点，即王权集权体制与竞争为王的苏丹继承制度、教权对王权近乎无条件的支持和依附所形成的政教同盟、掠夺扩张性的军政体制。^④ 而与其相应，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一个原因是文艺复兴后欧洲翻天覆地的惊人进步逐步改变了双方的强弱对比；另一个原因是促成奥斯曼崛起的上述关键性因素的变质与瓦解。

公平地看，奥斯曼帝国与我国清朝的乾隆朝相似，在旷世君主苏莱曼后期，帝国就已经显现出衰败迹象。苏莱曼大帝晚年谗信后宫、冤杀王子，从而为帝国的衰败和日落后宫干政埋下了祸根。自苏莱曼大帝之子“醉鬼”塞利姆二世（M est Selim II）起，帝国苏丹也与其突厥先王相似，“弟不类其

¹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6 月版，第 697 页。

^④ 参见姜明新：《伊斯兰化后突厥人对外扩张与奥斯曼帝国兴起》，载《西亚非洲》，2007 年第 7 期，第 42~48 页。

兄，子亦不肖其父”¹。1566~1730年，共有13个苏丹继位，他们多是平庸无能之辈，荒淫无耻之徒，他们不谙朝政，终日纵情声色犬马，致使大权旁落，乃至形成后宫当政、宦官、军人擅权的局面。

这种问题可以部分地从奥斯曼帝国苏丹继承制的变化中找到原因。以前，帝国王子们很小就被派往外省去学习积累治国、治军的经验，在王位继承方面实行天命神授、胜者为王的原则。及至十四世苏丹穆罕默德三世（Mehmed III），王子们不再被派往外地任职，终日被关在宫中一处叫做“卡菲”（Kafes）的小房间里，监视居住。不难想象，他们终日无所事事、担惊受怕。生命尚且朝不保夕，让他们治国安邦就更是无从谈起。自“醉鬼”塞利姆二世开始，奥斯曼苏丹就已经失去先辈开疆破土时那种“苏丹即是战士”的精神，难得御驾亲征，军队总司令一般交由辅政大将军担任。

由于苏丹的衰弱，以前听命于苏丹、为其行为在宗教经典中寻找论据的乌莱玛，^④现在也开始指手画脚，以致于苏丹“想要做点什么事的话，便必须设法去说服那些事事都得由他们来评断道理的乌莱玛，去说服不论过去的或是现在的国家掌权者”^④。

帝国的衰颓也可以从奥斯曼军队战斗精神的退化略见一斑。帝国初期，奥斯曼军队都是由具有十足加齐精神的圣战士组成，他们在苏丹——最伟大的加齐的带领下，为了弘扬圣教、加齐的荣誉和战利品，仗剑执戟，勇往直前。由于帝国的一切都是为从事军事征服而组织起来的，这包括军事行政制度、税收和土地分配制度，等等，而一旦失去了征服扩张的能力，就会造成帝国社会正常运转链条的断裂。而此时，不论是什么原因，帝国的扩张早已达到极限，向西无法逾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维也纳，向东无法有效占领波斯的大不里士。因此，史家首先看到的是，作为帝国基础的蒂玛制度的逐步朽坏和瓦解，以及近卫军的变质。一些蒂玛持有人破产，蒂玛权证甚至可以买卖或购买，另一些人开始规避对苏丹的义务，不愿出征，甚至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由于天下承平，那些骄兵悍将已无需浴血沙场，而开始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甚或啸聚山林，劫掠为生。^¼再则，苏丹不时将大量蒂玛土地赏赐给朝廷新贵旧宠，甚至后宫妇女，致使国有土地日益减少，私人土地日见增多，这种情况更加速了蒂玛制度的腐败和衰亡，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战斗力。

近卫军是帝国的一个特权阶层。还在苏丹塞利姆一世时期，那些近卫军将士就不愿在远离家乡的地方长期作战，并曾成功地迫使苏丹班师还朝。^½后来，由于参加近卫军有利可图，不少平民及近卫军官兵的儿子们都挤进了近卫军，甚至只领饷，不出勤，使军事训练和士兵素质大打折扣。他们贪图钱财，军纪败坏，飞扬跋扈，恣意妄为，早已失去了前辈们为苏丹献身的精神，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在对外战争中根本起不到决战决胜的作用。至帝国中后期，苏丹们根本就不具备先辈的勇武与睿智，毫无有效管束这支奴隶军队的 ability。相反，随着近卫军变得有钱有势，他们与宫廷和地方显贵同流合污，逐步成为了国内政治和宫廷斗争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甚至发展到多次逼宫作乱、恣意废立、杀害苏丹的地步，^¾成为对苏丹本人和帝国政府的一个威胁。当时的一个英国海军军官阿道尔弗斯·斯莱德爵士（Sir Adolphus Slade）在将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进行对比时曾如此写道：“君士坦丁堡的近卫军好比（欧洲国家的）下议院，他们时常逼着自己的君主撤换他的大臣，他们当中任何有才干的、善于搞党派活动和善于煽惑人心的分子，肯定都会得到一个好差使，以便使他平息下来。”^⑤因此，

¹ 突厥文阙特勤碑如下铭文，“吾先人死后，有以其弟为可汗，有以其子若孙为可汗，惟弟不类其兄，子亦不肖其父。御极者率皆无知之可汗，怯懦之可汗；其为梅录者，亦莫不无知与怯懦。”

^④ 参见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页。

^④ 同上书，第467页。

^¼ 16世纪末17世纪初蹂躏安纳托利亚农村的“杰拉利”（Cekelis）叛乱。

^½ 1514年苏丹塞利姆一世与波斯沙法维王朝伊斯梅尔王之战。

^¾ 计有1622年近卫军杀死奥斯曼二世（Osman II），1623年穆斯塔法一世（Mustafa I）被推翻，1648年废黜并绞死易卜拉欣一世（Ibrahim I），1687年穆罕默德四世（Mehmed IV）被废黜，1730年推翻艾哈迈德三世（Ahmed III），1807年废黜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808年穆斯塔法四世（Mustafa IV）被杀身亡，等等。

^⑤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前引书，第133页。

帝国的混乱和衰落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二) 奥斯曼帝国内部整肃式的复古主义改革

在经历了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几次大的军事失败后，奥斯曼的一批有识之士将帝国的问题归咎于苏丹权威的衰落、蒂玛和代夫沙梅制度毁坏，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上。而在穆罕默德·索库卢帕夏被刺后，朝廷里除了勾心斗角外，没有人能够找到根治帝国百病的良方。因此，帝国上下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整顿朝纲，进行必要的改革来重振帝国雄风。

穆罕默德·科普儒侣 (Mehmed Kopruk, 1656~1661 年当政) 可以说完全是应劫而生，他在 80 多岁时被推上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前台和权力顶峰。其时帝国内忧外患，奥斯曼舰队刚打了一场可耻的败仗，¹ 威尼斯舰队占领了爱琴海中的战略要地——利姆诺斯 (Lemnos) 岛和特内多斯 (Tenedos) 岛，直接威胁着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而帝国宫廷除了相互攻讦、争权夺利外，束手无策。

在从皇太后图罕 (Valide Turhan Hadice) 处取得强力支持^④后，科普儒侣首先在国内大刀阔斧然而又不失策略地进行改革，他高举“法先王”的大旗，着手恢复“立法者”苏莱曼大帝时的秩序和制度，维护和严格执行苏莱曼大帝制定的帝国法典。其核心是对内以铁腕手段^⑤惩治腐败，整肃军纪，镇压叛乱，重建苏丹的权威；在巩固了其国内地位后，奉行强硬的对外政策，重振军威，坚定地发动对外战争，并通过这一政策的成功，进一步巩固其政治地位和声望。

这些措施短期内立竿见影，吏治改善，军队恢复了纪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胜利。^⑥ 帝国不仅恢复了元气，度过了严重的危机，还在短期内勃发了新的威力。以致卡拉·穆斯塔法 (Merzifonlu Kara Mustafa) 帕夏在 1683 年——即苏莱曼大帝首次远征维也纳未酬 154 年后，再次围攻维也纳。

但是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如前所述，奥斯曼社会完全是为军事征服而组织起来的，因此，如果征服失败，其影响自然十分深远。科普儒侣家族的卡拉·穆斯塔法帕夏因此也死于宫廷斗争。此后，帝国再也无人愿冒杀头之险来承担责任了。

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在欧洲敌人的压迫下，奥斯曼内部也发生了内乱。沉湎于打猎的“猎手”穆罕默德四世 (Avcı Mehmed IV) 被废黜，军队拥立其弟苏莱曼二世，不久又由艾哈迈德二世和穆斯塔法二世先后继位。在经历了 1697 年影响深远的森塔 (Zenta) 惨败^⑦及一年多后耻辱的《卡尔洛维茨和约》(Treaty of Carlowitz)^⑧之后，帝国的有识之士才开始认真地反思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了。

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

科普儒侣家族 4 任大维齐^⑨在奥斯曼帝国传统框架内的改革，在穆斯塔法·科普儒侣战场殒命后就

¹ 1656 年 6 月在达达尼尔海峡与威尼斯舰队之战，奥斯曼舰队大败。

^④ 参见 [俄国] 伊兹科维兹著，丰培培译：《帝国的剖析》，学林出版社，1996 年版，第 72 页。科普儒侣在接受任命前，史无前例地提出了 4 个条件：(1) 没有他本人发出的书面通知，苏丹不得批准或发出命令；(2) 任何大臣或其他人不得背着他单独行动；(3) 他任命一切高级或低级官员，都不受干预；(4) 苏丹对直接诽谤他的话不要听信。图罕接受了科普儒侣的这些条件。

^⑤ 在他执政的 5 年内，处死了 4 万名反对派成员，其中包括希腊东正教大主教。

^⑥ 1657 年 8 月、11 月分别收复特内多斯岛和利姆诺斯岛。

^⑦ 1697 年 9 月 4 日，奥地利哈布斯堡 (Habsburg) 军队在军事家萨伏依 (Savoy) 公国欧仁亲王 (François-Éugène Prince de Savoie-Carignan) 的指挥下，在匈牙利的森塔与奥斯曼帝国军队会战，全歼奥斯曼军队，该军队指挥官丧失殆尽，仅苏丹穆斯塔法二世侥幸逃脱。

^⑧ 1698 年 10 月，在英国驻奥斯曼大使佩吉特勋爵的调停下，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威尼斯、波兰、俄罗斯、荷兰的代表在卡尔洛维茨举行和平谈判。1699 年 1 月 26 日，在“占有地保有原则”下双方签署和约，奥斯曼人从特兰斯瓦尼亚和匈牙利各地撤退，只有丹塞瓦的巴纳特除外。奥地利得到了匈牙利、特兰斯瓦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大部，威尼斯获得了希腊的莫里亚半岛和达尔马提亚一部，波兰则收复卡美涅茨和波多利西亚。贝尔格莱德和雅典仍由奥斯曼控制。《卡尔洛维茨和约》被视为奥斯曼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是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标志。

^⑨ 即穆罕默德·科普儒侣、其子艾哈迈德·科普儒侣、女婿卡拉·穆斯塔法、另一子穆斯塔法·科普儒侣。此后，科普儒侣家族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名门望族。

已基本结束，而其家族的第五任大维齐侯赛因·科普儒临危受命后已经不能如其前辈一样力挽狂澜，重塑军威、国威了，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审时度势、勉力利用欧洲各国当时的矛盾以尽量减少帝国的损失。从这时开始，奥斯曼帝国已经不能继续充当欧洲事务的干涉者和欧洲均势的杠杆，相反，它还得充分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勉力图存。这表明，传统框架内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旧体制的活力已经几乎被挖掘净尽了。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帝国精英们必须另辟蹊径、放眼向洋，以变革图强。

然而，对任何一个曾经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来说，长期的繁荣、强盛所形成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负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包袱与障碍。

与伊斯兰上升时期一样，在帝国兴起之时，奥斯曼土耳其人还能不断地学习，是个典型的学习型社会。¹ 其时，帝国勃勃的生机吸引了大批西方的学者、基督教叛教者及各类冒险家纷纷来到奥斯曼帝国，他们对奥斯曼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军事技术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到帝国鼎盛时期，由于不断取得对西方异教徒的胜利及随后持续的天下承平，奥斯曼人的进取心和加齐精神已经逐步消磨掉了，而代之以纸醉金迷的淫靡之风。而且，在他们眼中，当时的西方基督教社会乃是一个野蛮、蒙昧的化外之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还值得文明世界的穆斯林学习了。可以说，也正是这种由一系列胜利所带来的自负助长了奥斯曼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妄自尊大和不思进取。

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初期的西化改革注定要面对更多的血腥和暴力，而断断续续长达 200 余年的西化改革更多地浸透着改革者的鲜血，进而，他们的鲜血经由战争与和平的洗礼逐步完成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从文化自负向文化自卑的滑落。同时，在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冲击下，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也从初期的军事改革走向了体制变革，并最终在帝国的废墟上走向共和。

（一）初期的西化尝试

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尤其是 1699 年《卡尔洛维茨和约》与 1718 年《帕萨洛维茨和约》的刺激，让帝国精英们深切了解了欧洲国家所拥有的军事优势。而同时代俄国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的成功，也让长期轻视俄罗斯人的奥斯曼帝国认识到了军事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④

1718 年，大维齐达马德·易卜拉欣帕夏上书艾哈迈德三世，表明必须赶上西方国家的军事水平。^⑤ 1719 年，他下令在维也纳设立大使馆，1721 年他任命穆罕默德·埃芬迪担任帝国驻巴黎大使，“详细研究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⑥，随后在帝国上流社会形成了一股法国热。此外，他还着手对帝国海军进行改组，下令继续建造一批新式战舰。但就是这样肤浅的革新也遭人忌恨，1730 年，近卫军借口与波斯作战失利挑起了一场暴民叛乱，艾哈迈德三世被迫退位，大维齐易卜拉欣帕夏等一批改革派官员被处死。

易卜拉欣等改革者的死亡表明，即使是奥斯曼普通的穆斯林也对向异教徒学习十分反感、甚至十分仇视，而这也是保守势力能够煽起暴民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此时的穆斯林世界已不像伊斯兰早期那么包容、好学，倾心“翻译运动”^⑦，对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兼收并蓄了。这一点，也能从另一位热心西化改革、对西方人士和观念持友好态度的大维齐哈米德的横死得到证明：1785 年，保守派倒阁成功，并将他秘密处死，为了泄愤，还在他的尸体上插了个标明其罪恶的牌子——“教规和国家的死敌”^⑧。

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对于一个自负守旧的国家来说，走向文明和进步的代价已经不仅仅是少

¹ 圣训中记载，穆圣说：“求知对穆斯林男女都是天命”、“求知须从摇篮到坟墓”、“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参见《伊斯兰的教育观》http://www.cnr.cn/2008zt/cl/hxfq/200806/20080612_504827979.htm 关于奥斯曼人向欧洲学习的情况，参阅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前引书，第 48~52 页。

^④ 指 1696 年奥俄对土战争中俄军攻起亚速港，俄国势力首次进入黑海。

^⑤ 参见 [美国] 戴维森著；张增健、刘同舜译：《从瓦解到新生》，学林出版社，1996 年版，第 81 页。

^⑥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前引书，第 53 页。

^⑦ 指阿拔斯王朝中期（回历 136~300 年），在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阿拉伯学者对波斯、印度、希腊著作的大规模翻译和介绍，尤其是起自买蒙时代的“百年翻译运动”，将希腊时期各个学科最重要的著作翻译成了阿拉伯文。

^⑧ [美国] 戴维森著；张增健、刘同舜译：前引书，第 83 页。

数改革者的鲜血。历史有它自身的逻辑，而战争就成为了动荡社会引发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我们几乎无法否认，奥斯曼的西化改革始终是被迫的，因此，一旦天下泰平，改革自然也就失去了动力。因为，没有人甘愿背负叛教的罪名、再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但是，1774年俄土战争的失败和《库楚克·凯纳利亚和约》的缔结表明，帝国已是大国不再，昔日的辉煌仅仅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而1787年俄土战端再起和帝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更是将帝国君臣逼上了全面改革之路。

（二）塞利姆三世的“新秩序”改革

塞利姆三世（Selim III）的改革通称“新秩序”（Nizami Cedit），这是奥斯曼帝国真正意义上面向西方的改革，也可视为土耳其式的“洋务运动”。改革的动力也来源于对外战争的失败，尤其是1774年对俄战争惨败后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利亚和约》的刺激。这一改革没有脱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套路，着重于军事改革，苏丹本人对近卫军在战争中的作用已经完全失望，而着力于建立西式军队的尝试。他认为，只要进行必要的军事改革，就可以重振国威，消除各种内忧外患。自1792年起，他先后颁布了一整套新法令，实行军事、财政改革，按欧洲方式创建并苦心经营一支使用新式武器的新军——新秩序军团，并建立了陆军工程学校和海军工程学校，任用法国人和一批欧化土耳其教官进行训练。¹其目的是把奥斯曼军队的技术装备、训练和战术提高到当时西方军队的水平。

但是塞利姆三世的改革遭到了来自近卫军及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伊斯兰社会尊崇先知的训导，守旧恶新，因为先知说过：“最坏的东西莫过于新奇的东西，每件新奇的东西都是一种革新，每种革新又都是一个错误，每个错误都可以导向地狱之火（注：应译为“火狱”）。”^④改革遭到近卫军和贵族、乌莱玛的反对并不意外，塞利姆三世在创建新军时就特意回避与近卫军的冲突，而把新军放在远离京都的郊外。因为以前辅政大将军易卜拉欣帕夏所推行的法国模式的改良就曾遭到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其时，改革的重点仍是以推进军队现代化为核心的武器装备与训练、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军队组织的革新。但即使是这种改良也已经付出惨痛代价，艾哈迈德三世（Ahmed III）被推翻；易卜拉欣帕夏被杀身亡。而这回又轮到塞利姆三世了，1807年他被迫解散了新军，并任命近卫军的阿加（统领）任辅政大将军，但这也无法挽救自己的命运，当年他还是被废黜了，一年后被害。近卫军控制了伊斯坦布尔，许多改革者惨遭杀害，改革成果化为云烟。

塞利姆三世改革的失败给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一个深刻教训：必须消灭保守势力的支柱近卫军，才能推动国家全面革新。

（三）马哈茂德二世的铁腕改新

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是幸运的，他作为奥斯曼皇族硕果仅存的继承人而在近卫军叛乱中幸存下来。经过十几年的忍耐，马哈茂德二世在平复了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后，于1826年5月也祭起“法先王”的旗号，重新建立起了一支新军。同年6月，在近卫军再次发动兵变时，他指挥勤王部队和重炮予以坚决镇压，两天后宣布废除近卫军，从此，延续了数百年的近卫军制度就此覆灭。^④随后，马哈茂德二世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并全面推进改革：他消灭了与近卫军关系密切的伊斯兰托钵僧势力；加速新军——穆罕默德胜利之师（Asakir-i Mansure-i Muhammediyeh）的建设；1831年又宣布废除早已腐朽的蒂玛制度；随后又将伊斯兰宗教势力、与近卫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乌莱玛阶层的经济支柱——埃夫卡夫（“evkaf”，意为教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削弱了乌莱

¹ 参见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前引书，第65页。

^④ 同上书，第115页，但其引文注释指向他的另一篇文章。形式相似的内容见诸 [埃及] 纳·阿·曼苏尔著；陈克礼译：《圣经》第一编第一章第七节“坚持天经与圣训、反对邪说和教派、信士的任务”第65中文译文为“札比尔的传述：穆圣说：‘最真实的话，便是真主的经典；最正确的领导，便是穆罕默德的领导；最可恶的事件，便是异端邪说；凡是伪造的都是异端，凡是异端都是迷路，凡是迷路都进火狱。’”意义迥异，但有明显的内在联系。在《布哈里圣训实录》、《马立克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和《阿布·达吾德圣训集》（部分）中没有找到类似表述。See <http://www.usc.edu/dept/MSA/reference/searchhadith.htm>

^④ 土耳其史称“吉祥事件”（Vaka-i Hayriye）。

玛宗教势力对抗皇权的基础，而将各种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尽管遇到了相当多的反对，马哈茂德二世运用手中的独裁权力，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将变革推向奥斯曼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如同中外的许多铁腕君主一样，他也强力推动奥斯曼服饰的改革，他率先剪掉了长发，恢复了突厥人剃光头的旧习，推广欧式服装和费兹（fez）帽。¹他仿照欧洲各国的样式建立了中央各部委，改革了税收、邮政和教育部门，撤消了阻碍商业发展的关卡，改善了国内交通状况，并创建了一份报纸《大事概览》（Takvim-i Vekayi），等等，不一而足，而新成立的翻译局和外交机构更成了培养帝国新一代政治家和改革派的摇篮。

（四）“坦奇马特”运动和立宪改革

阿卜杜拉·麦吉德（Abdulmecid）苏丹继位后开始的坦奇马特（“Tanzimat”，意为改革，1839~1878年）可以视为其父马哈茂德二世改革的合理延伸，前后断断续续地延续了40年，在奥斯曼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它主要是由改革派强势人物雷什德帕夏（Mustafa Resid）全力推动的。雷什德帕夏及其后的改革领导人阿里帕夏、富阿德帕夏都是出自外交部门的新一代政治家。新的改革以著名的“御园敕令”（Gulhane-Hattı-Humayouni）为开端，覆盖了法律、司法、外交、教育、财政、军事、行政等方面，并且首次宣布，帝国臣民不分信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改革充分体现了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治国理念和法律精神。不仅如此，麦吉德苏丹还主动试行了一次全国省区贤达会议（Assembly of Provincial Nobles），最为重要的是在西方思想影响下，在坦奇马特后期颁布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选举产生了立宪议会，等等。

虽然坦奇马特和立宪运动在奥斯曼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它们的推出都只是帝国精英挽救危亡的一种手段。在颁布御园敕令之时，帝国正处于危急关头，桀骜不驯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在尼济普击溃了奥斯曼军队，并继续进军。此时的帝国急需欧洲列强的支持，为了取悦欧洲列强、表明苏丹政府能够成为一个开明而现代政府，新受命的大臣们才制定了这一敕令。这并不是臆测，根据伯纳德·刘易斯的研究，就连普通欧洲人都自负地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和结构极不文明，且糟糕透顶，只有迅速地采用欧洲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土耳其才能取得文明国家的地位和资格。并且，“这种看法，是欧洲各国政府以及它们的使馆，向土耳其的政治家们强调提出的，终于被土耳其统治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慢慢接受了”^④。而1876年宪法只是在泛斯拉夫主义和俄国准备干涉的压力下产生的，力主立宪改革的大维齐米德哈特帕夏等帝国精英希望把这部宪法当做对付列强的有力武器，他力图向欧洲列强表明，帝国完全有能力自行改革，且有能力处理自身的问题，并在即将发生的俄土战争中尽可能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对这部宪法，阿卜杜·哈米德苏丹从未给予过任何积极的支持，尽管他为了登上皇位接受了这一条件。因此，一旦苏丹觉得宪法和议会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宣布休会，而且这一休就是整整30年，从而在事实上终止了宪法的实施。直到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他才被迫宣布恢复宪法。在废黜阿卜杜·哈米德后，经过1909年的宪法修改，^④奥斯曼苏丹成为了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奥斯曼帝国君主专制结束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独裁统治开始了，历史并没有翻开新的一页，奥斯曼土耳其人注定了要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继续摸索。

对帝国西化改革的初步观察

通观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两条明显的轨迹，一条是奥斯曼精英从被动改革向主

¹ 头饰在穆斯林社会中是表示所属宗教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发型、头饰和服饰的整齐划一在社会剧变时期曾经产生过显著社会效果。有意思的是，在马哈茂德二世时期作为革新标志而广受非议的费兹帽，在凯末尔革命后却作为伊斯兰传统和保守主义的标志而被再次革掉。参见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前引书，第107页。

^④ 参见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前引书，第113页。

^④ 参见1909年8月宪法修正案第三条、第七条。

动改革的转变，尽管这种主动也是一种无奈，¹ 与此相辅相成，另一条则是社会心理从文化自负向文化自卑的嬗变。这一点我们不仅能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还能通过作为帝国精英之一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唯一文明论”^④及现当代土耳其精英的西化渴求中得到印证。这两条轨迹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对土耳其传统社会的瓦解与现代社会和政治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马哈茂德二世的铁腕改革及随后从坦奇马特中生发出来的思想，对后世土耳其的现代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我们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改革中发现了从手段到内容的某些相似性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改革也为奥斯曼帝国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西式教育、思维活跃、具有远大理想，且雄心勃勃的新型人才。

但是，奥斯曼帝国所有的这些改革都是在外来压力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它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意愿，而仅是出于帝国精英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甚至是“结与国之欢心”^⑤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人民只是改革的承受者，在激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他们集体“无意识”。即便是在阿卜杜拉·麦吉德苏丹举行的史无前例的全国省区贤达会议上，这些代表、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代表仍然举止无措，不知云何，乃至干脆缄口不言。^⑥这从一个方面表明，在这个社会的潜意识里，治国就是苏丹和上层人物的事，民众处在苏丹的庇荫之下，只要苏丹执法公正，帝国臣民就能够各安其位，奥斯曼社会就会在“公平的循环”^⑦中和谐发展。这种民族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土耳其日后社会变革的方式和历史进程。此后，基本是军人出身的铁腕强人强力推行自己治国设计的模式，占据着土耳其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迄今仍然在土耳其政治中起到独特的作用，并显现出全新的表现形式。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安春英)

¹ 参见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前引书，第 174 页。

^④ 凯末尔曾说：“……文明只有一个，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进步，便必须参加到这个单一的文明里面去。”而他所指的文明仅是西方的现代文明。参见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前引书，第 307~308 页。

^⑤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语。关于奥斯曼帝国当时的局势，参见 [美国] 戴维森著；张增健、刘同舜译：前引书，第 94~95 页。

^⑥ 参见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前引书，第 120 页。

^⑦ 参见 [俄国] 伊兹科维兹著；丰德培译：前引书，第 80~81 页。

· 资料库 ·

撒哈拉以南非洲 吸收 500 亿美元私人投资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最新地区展望报告，2007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吸收私人资本投资达 500 亿美元。

该报告认为，私营资本加速进入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带来机会，尤其是近几年在外援不变的情况下，私营资本的进入，为该地区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投资项目提供了资金，促进了经济增长，有助

于这些国家实现发展目标。该报告发出警告，私营资本的进入，可能增加宏观经济的变数，对金融领域造成冲击。报告指出，从长期看，私营资本带来的利益取决于本国机构得到改进和金融市场得以完善。

(资料来源：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经商参处，2008 年 6 月 18 日)

(詹世明 摘编)

The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the Gulf Arab States in Shadow of Nuclear Issue

Yu Guoqing

pp. 23– 28

There were many contradictions in the history between Iran the Gulf Arab states and their relations have shown some improvement after the Iraq War. Iran and the Gulf states gradually find new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ran's nuclear issue. This change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America's Middle East policy and it also has struck the geopolitic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U. S. in this area. But both the future of Iran's nuclear issue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the Gulf Arab states will meet with great variability.

On Westernization Reform of the Ottoman Empire

Jiang Mingxin

pp. 29– 35

There were two basic elements for the Ottoman Empire to carry out westernization reform. One was that the Ottoman Empire gradually waned in power and the other was the failure of its strict reform back to the ancients. The westernization reform was underway by pressure coming from outside world and conducted from above which reflected nothing from the demands of the people. The aim of the reform

was to make the empire to become strong and rich and the goal was to save the fate of the empire. During this reform proces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Empire transformed from cultural conceit to cultural inferiority and this phenomenon ha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of modern Turkey.

On China's Role in Dealing with Africa's Internal Conflicts

—Assessment on the Theory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ion”

Yuan Wu

pp. 58– 62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power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ountry in world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hopes that China should take on heavy responsibilities in world affairs. But there remain different viewpoints and understandings on China's role in world affairs in academic fields. For

example, China has played positive role in resolving Darfur issue but some west countries still criticized Chinese actions there. The content about how to resolve humanitarianism crisis in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on” theory has in fact affirmed and encouraged the ways of Chinese role in resolving African crisis.